



四平曾经最辉煌的老国企——联合化工工厂的故事

侯景宝

传统报纸受互联网的影响,影响力不如之前大了,可想当年一张小报那是我们厂的骄傲。
一张报纸,刊登厂里的大事小情,工人们管这一份土得掉渣的小报,亲切地叫“厂报”。我与厂报结缘是在1988年,刚参加工作。有一天,塑料车间的同事吴姐拿一张联化工人报,对我说:侯老弟,喜欢写点东西,可以投稿,姐帮你送去,还有稿费呢。我那时是三班倒的工人,第一次听说有厂报。于是就尝试着写几篇豆腐块的小文章。至今我还记得,第一次看到我名字变成铅字的那个情景。那天我去二车间盐水工段找同学二根去玩,他从塑料车间

被借调到盐水工段砸盐块,我一进休息室,他就对我说,哥们,你写的文章登报了,我当时有点小激动。文章题目是《水》,我至今还记忆犹新,它为我增添了很多信心和激情,于是我在工作之余,就经常往厂报投稿,每当厂报上出现我的名字,心里就美滋滋的。我1988年入厂当工人,到1995年提拔为总厂团委副书记,厂报一直陪伴我成长。如果没有这个平台,我的写作能力不可能提高;如果没有这个平台,我的名字也不可能让大家知晓。记忆中,厂报随着联合化的兴衰,经历了创办、发展、辉煌、没落几个阶段。厂报最初创办时,都是手写稿,然

后去四平日报社铅字印刷。最早是一月一期,后来一月两到三期。厂报最初叫《联化工人》,后来叫《四平化工》,1993年划归中化集团,更名为《中化四平报》。姜文明的摄影作品经常在省市报刊、工人日报、中国化工报上发表,1992年以后,他撰写的企业新闻和新闻摄影作品多次登上《人民日报》。厂报是老国企的一个标志,是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,适合怀旧的季节,我们缅怀,向那个充满情怀的老国企年代致敬。青春散场,不诉离殇。怀念啊,那个油墨飘香、苦中作乐的年代,那些点灯熬油格子的夜晚……

联合化的广播站隶属于厂党委宣传部。业务有两大部分,一部分是通过大喇叭对厂区播音;另一个是通过有线电视台,对住楼房的家属区播放厂内新闻,同时转播凤凰卫视中文台及其他电视台的节目。住平房的家属区是收看不到的。联合化在当时也算是有名气的单位,因为,那时候在四平市区内能收看到凤凰卫视台也是不容易的。说起广播站,那是联合化工厂的一个符号,是几代联合化人的一份情怀,是大家共同拥有的记忆点。每天播音4次,不知不觉成了职工们上下班的信号。每天清晨,迎着旭日朝阳,合着欢快的乐曲,听着熟悉的声音,开启了新的一天,迎接职工们走进厂区、走进车间、走进联合化这个大家庭。因为一家老小的生计都和它息息相关,它的荣辱兴衰也无时无刻地牵动着一家几代人的衣食冷暖。每当下班时,喇叭一响,大家都陆陆续续从各自的车间、科室走出来,汇集在厂区的主干道,然后再熙熙攘攘、连说带笑地走在回家的路上。听我岳父说,上世纪六十年代,岳母曾担任过广播站的播音员,梳着两条大辫子,甜美的笑容、清脆的嗓音,在物质十分匮乏的年代,给我岳父带来了浪漫与温情。我1988年职业高中毕业,被分配到塑料车间当工人,经常往广播站投稿,在大喇叭中常听到“通讯员侯景宝报道”的声音,这样我的名字渐渐被大家熟悉了,为我今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联合化也有它自己独特的酒文化,每次讲这个话题,都得从铝饭盒唠起。

1988年我参加工作,带饭盒上班是那个时候的标配。每个车间都有个大蒸锅,专人管理、定点开关。每到开饭的时候,班上的同事都会聚在一块,把各自自带的菜凑在一起,没有人会吝啬自己的肉食被别人吃,也没有人为自己的素菜上不了台面而自卑,大家和和气气的互通有无,也许是孩子是自家的好,饭菜是别人家的香,吃饭的时候,都是在你推我让、嘻嘻哈哈的欢笑中度过的。男同志们比较喜欢四点半,因为车间领导们白班都下班了,四点半可以偷偷地喝点酒,就用饭盒盖装酒,别看不起眼,但真能装

酒,一个底儿差不多就得二三两,那时候的大高粱真有力啊。我的壶中岁月就是从联合化塑料车间开始追溯;我的杯里乾坤也是从一个小小的饭盒盖开始丈量。铝饭盒,是那段历史的见证,现在没有人再用铝饭盒。然而,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,仍将它保留在家中,或是当作一件摆设,或是放家中的杂物,却舍不得丢掉。因为,就是这些坑坑洼洼、岁月斑驳的铝饭盒,留下了时代的印记,仿佛在告诉人们,它所经历的岁月。每当打开饭盒盖,就打开了那段带饭上班的记忆。那一份亲切、那一份情怀,裹着一缕浓浓的烟火气息,酝酿出幸福的味道,永远萦绕在那个年代人的心头。

说起联合化喝酒的故事,还绕不开西门和南门附近的饭店。这两个厂大门是职工上下班的必经之路,联合化辉煌的时候,两个大门的附近开了很多家饭店,他们依附于联合化而生,厂兴他旺,挣了几年好钱。印象中,西门附近比较火的饭店有:狗肉馆、北二大饼铺、贵君、薛记等。那时候去饭店吃饭流行签白条,小饭店也有扛不住黄的。每到开支的时候,就看饭店老板手里掐着一沓饭条子,挨家去结账。大家都在一个大院上班,真是应了那句低头不见抬头见的,约好饭店,各自分头去。如果结伴而行,要低头快走,你要是抬头走,很容易拉一帮人,一个桌都坐不下。几个好哥们凑到一块,我买几根黄瓜花生米、你买点桔梗和香肠,他买半个板鸭带个料包,再买几张熏肉大饼,齐活,然后找个地开喝。联合化喝酒的故事还有很多,比如二十五中附近的烧烤,几个马扎,围着炉子,烤着奶盒子,就着宴丰小烧;比如盐水工段的徐哥那句经典话:哥喝酒不挑,能把我整迷糊的那个就行;比如经常去蔡三哥家,吃嫂子吴丽萍包的包子等。

联合化工厂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,就像陈年的酒,越品越香,多少人在这里出生,在化工厂附近的大街小巷留下了青葱的记忆;多少人在这里奋斗,从黑发到荒烟蔓草披荆斩棘,到白发苍苍,和化工城融为一体;多少人从这里奔向远方,却留下了难以割舍的羁绊,直到地老天荒。(下)

首任梨树县委书记沈亚钢

单志

二、沈亚刚在梨树组建县委、县政府

1941年5月,沈亚刚在冀南党校参加整风运动。1944年,受党组织调遣,沈亚刚同爱人马庚等四人一起去延安,在延安党校带病参加整风学习,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整风文献。

1945年6月,参加延安整风,使沈亚刚在政治思想方面有了飞跃性的提高。

“九三”胜利后,中共中央及时向党发出“向北发展,向南防御”的指示。从关内调入11万主力部队和2万余干部,从陆海两路向东北进军。沈亚刚随东北干部队伍,在总队长张秀山的带领下,于1945年10月到达沈阳,正赶上党中央指示“让开大路,占领两厢”,东北局给每个人写了条子,让每个人自己去四平。沈亚刚、马庚等在沈阳短暂休整,第四天,扒运煤车来到四平,接待他们的是苏联红军司令部人员,他们找到辽北省委以后,辽北省委留沈亚刚任宣传部副部长。

10月下旬,辽北省委派秘书周健接收梨树,周健带领警卫员李有贵,两匹马、三支枪来梨树组建民主政府。10月末,辽北省委派沈亚刚到梨树任县委书记,并派来马庚、吴培恩、刘启新等人组建梨树县委加强县民主政府力量。县委成立后,驻在伪县长公馆里,当时斗争形势极其严峻,明有国民党保安队、政治土匪的袭击,暗有特务反动地主武装、地痞流氓的破坏。社会动荡不安,秩序十分混乱,加之群众的觉悟不高,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部队持怀疑态度。沈亚刚和周健带领县委和县民主政府工作人员克服重重困难,对反动势力采取打击、清查、瓦解等方法,发动广大人民群众,积极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,削弱敌人,壮大革命力量,同时在辽北省军区所属部队的配合下,强行解散国民党保安队,组建县武装大队,沈亚刚任县武装大队政委。同期,组建各区工作委员和区政府,10月组建建七区孤家子、八区刘家馆子、九区喇嘛甸区委、区政府。11月和12月先后建起六区榆树台、五区小城子、四区万发街区委、区政府;1946年1月建起一区梨树区委、区政府;2月建起三区郭家店区委、区政府。

1945年11月,县委举办第一批干部培训班,吸收伪县公署部分职员、进步青年、爱国学生共30多名参加培训,沈亚刚亲自讲课,通过具体事例讲解革命道理,启发学员的阶级觉悟和斗争观念。通过一个月的培训,这些学员成为梨树县解放初期革命斗争的骨干力量,选拔到县、区机关参加工作。在此后的实际斗争中吸收先进的工人、农民、学生、知识分子加入党的组织。从1945年11月到1946年5月,共发展党员30多名,壮大了党的队伍,也充实了干部队伍。



1945年底,沈亚刚带领县委、县民主政府,以梨树城区为中心,开展反霸和清算敌伪资产的斗争。没收了伪县长崔宝山和匪首王永清的财产,清算了富盛泉、郑家油坊等八大商号的财产。把这些财产分给穷苦大众。对十恶不赦的恶霸、地主、汉奸进行公审、公判。在斗争一贯打骂群众的吴振中(吴小巴掌)大会上,沈亚刚气愤难耐,狠狠地抽了吴振中(吴小巴掌)一个嘴巴,让他感受被打群众的滋味,之后押到西门外执行枪决。

四平保卫战期间,沈亚刚随东北民主联军战斗在四平前线。5月18日,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前线指挥部和主力部队奉命撤离梨树和平,凌晨三点多钟,沈亚刚随北撤部队到达榆树台,他叫醒为稳住蒙匪而喝醉酒的马庚,一边召集全区工作人员销毁文件,开库清仓,粮食就地分给老百姓,布匹送给部队,钱币和枪械物资装袋打包,装车带走。一边召集老、弱、病、残人员和家属准备先行撤离,这时县委机关支部分书记赵芝哲等率领的老、弱、病、残和家属的车队已经到达。沈亚刚为保证这些人员的安全,调来10名警卫、10匹马、全部短枪,由马庚、赵芝哲两人负责,先行撤往双山,其他人员武装待命,准备策应梨树的部队。(三)

第二编

四平党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

(1931年9月—1945年8月)

党史

许多爱国教师利用课堂教学等各种有利条件,向学生灌输反日爱国思想,激发学生的民族主义情感,自觉抵制日伪的奴化教育。其典型代表就是先后在梨树国高、四平师道学校任教的谭宝珍。

谭宝珍,字希儒,1902年生于梨树镇。1922年在北京中文专科学校毕业后,在山海关田氏中学任教,后又先后出任安东中学、沈阳西沙岭中学和西丰中学校长。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激起了他对日寇的强烈愤慨,他毅然投笔从戎,参加了抗日队伍,兵败后,隐姓埋名回到家乡任教。1940年春,谭宝珍从梨树国高被调到四平师道学校担任国文教员。

在这残酷的白色恐怖下,谭宝珍给同学们讲岳飞飞的《满江红》一词,以此激励学生“莫等闲,白了少年头,空悲切”,抒发抗敌雪耻“待从头,收拾旧山河”的雄心壮志。

在谭宝珍的引导和影响下,在他任教的班级里形成了一个秘密的反日团体。他们时常在学校体育场南边的树林子里开会,研究具体的反日活动。他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印发传单,扩大反日救国宣传,号召不愿作奴隶的人们行动起来,参加到抗日的行列中来。他们先后印发传单数千张,散发到全市各中小学以及机关、街道群众中去,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。

1942年12月7日早晨,四平女子国民高等学校(今三中校址)住宿生上自习时,发现临街教室被新打破的玻璃窗下有一捆纸,打开一看是用蜡纸印刷的传单,上面写着:“亲爱的同胞们,在今天这个日子里,请大家

想一想吧,我们过的是什么生活,受的是什么教育,忘掉了祖国没有?……”学生看完后,担心祸事临头,索性投到火炉里烧掉了。但事情并没有瞒得住,终于被敌伪警宪知道了,把三年级学生翟雅珍和高玉琴带到伪警察署,经过严厉逼问,一无所得。事情很巧,翟雅珍是伪四平市长翟书田的孙女,于是拘留一夜就释放了。

同日早晨,四平晓东国民高等学校学生,在厕所附近也拣到传单。大家争相传阅,后被胆小怕事的丁国华舍监知道了,报告给日本校长。日伪知道后,赶紧派警宪到学校,把住宿舍全部拘禁于学校礼堂(走读生尚未登校),迫令学生们脱下衣服,肆意检查,所有笔记本和油印文件等均被拿走,以对照字迹和墨色。日伪警察们查看了每个教师的教案,对照字迹,查看钢板蜡纸、油墨、油印机、印刷用纸,与反满抗日传单相对照,他们还调查教师这几天的行踪,结果他们枉费心机,什么也没得着。

这一天,四平师道学校同样发现了传单。学生在吃早饭时,校方下令,紧急集合,学生都集中到操场上。日本人大町校长上台讲话,他说:“昨天的夜里,有人向我校撒传单,谁的拣着啦!快快承认的好。”特修科二年级级长张凤起站出来:“我拣着了,放在桌子还没有打开,

不知道是什么内容。”他回到教室拿来传单,交给了学校。这时,日伪警宪已经把学校包围起来,严禁人们出入,追根问底,终于把特修科二年级这个班全体学生带走。过几天后,多数学生被放回来了,仍扣押张凤起等5名学生,接着又逮捕了语文教师谭宝珍。

四平中等学校师生的爱国行动,激怒了敌伪警宪和特务,他们到处搜捕,尤以师道学校为重点。凡是中国教师和学生都是他们监视的对象。不时传讯,百般伺下。一听到校门外的摩托声,令人预感到没有好事。平日静穆的校园,顿时变成阴郁恐怖的世界。

1942年12月的一天,谭宝珍和许多同学被捕。在四平宪兵队,谭宝珍受尽了酷刑,但他始终坚持说:“散发传单是我一个人干的,和学生并无关系,要杀要剐,你们随便好了!”

一次,家人去看他,他嘱咐家人说:“你们不要花钱为我活动了。我决心已定,此生没有什么大本事,只以一死报效中华。若能唤起民众,我死不足惜。”

后来谭宝珍被移送到伪新京监狱,在这里,他又多次惨遭酷刑折磨,致使牙齿全部脱落,伤痕累累。1944年9月1日,谭宝珍被杀害,时年42岁。

(未完待续)

